

六朝分权体制考

——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

李济沧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7)

摘要: 六朝为门阀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但是, 皇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 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 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南地域社会之上, 没有了后者的支持, 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 毫无所据。所以在东晋, 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 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 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 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 贵族将无法存在, 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 没有贵族, 皇权将失去依靠, 无法应对豪族; 而没有豪族, 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当皇权受到威胁时, 贵族和豪族都要出手相助; 当皇权强大, 侵犯了自己利益时, 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 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

关键词: 六朝; 东晋; 国家权力; 地域社会; 门阀贵族; 分权体制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09)04-0221-06

众所周知, 六朝国家权力的结构表面上为皇帝专制体制, 但实际掌握军政大权的是门阀贵族阶层。这种权力构造, 与前此的秦汉、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显著不同, 用“君主与贵族之共议体”抑或“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的概念理解, 是目前较为稳妥的观察视角^{[1] 338}。不过我们还可作进一步认识, 即共议或共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分权体制的体现, 因为君主与贵族如果没有形成对峙, 或者说没有形成势均力敌, 就无从谈论共治, 因此君主与贵族之间形成的分权体制实际上即是两者互相牵制、互为依靠关系的一种反映。再看六朝时期的地域社会, 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江南豪族^[2]。当国家权力试图将其自上而下的统治贯穿于地方社会时, 往往受到具有一定自律性的豪族及地域社会的抵制, 从而导致国家统制无法得到全面贯彻。因此, 在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亦呈一种分权态势。本文的目的, 便是分析上述两种分权体制的成因及具体状况。至于探讨的素材, 则放在东晋初期, 因为东晋南朝的王朝体制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的。

一、东晋皇权的建立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首都洛阳为匈奴刘聪攻陷。318年, 最后一位皇帝愍帝为刘聪所害, 西晋亡。同年, 避难江左的侨姓贵族拥戴琅邪王司马睿(元帝)建立

东晋政权。司马睿的祖父琅邪王司马伷, 为司马懿之子, 但从武帝司马炎的谱系来看, 司马睿只不过是一个旁系皇亲。那么, 他究竟是如何提高自己的权威, 在异乡江南重建皇权的呢?

公元307年, 终结八王之乱并掌握朝权的东海王司马越, 采西晋初实施的宗王出镇之制, 自镇许昌, 同时遣其胞弟司马略、司马模、司马腾三人各据地方重镇^[3]。作为这项政策的一环, 八王之乱中忠实地追随司马越的司马睿经谋臣王导策划, 于同年七月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出镇建邺(后改为建康)。

上述遣宗室诸王据守重镇的制度, 实际上即是采取封建的方式, 以之为藩屏与中央遥相呼应。司马睿来建康, 实际上也肩负着这一使命。具体而言, 目的有二: 一是将南方丰富的米谷运往北方, 支援限于四处征战之中的司马越军; 二是负责牵制坐拥强兵的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周馥, 此点更为重要。《晋书》卷六十一《周馥传》载周馥“每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 言论厉然”, 二人势同水火。310年, 周馥上奏奉迎怀帝的迁都计划, 更让司马越激怒不已, 于是与司马睿联手击破了周馥。

但出镇江南, 对司马睿来说却是异常艰难, 其原因主要为江南地区在两晋之际的特殊地位。280年, 孙吴政权为西晋所灭, 其后虽历20余年, 江南之地仍然是“吴人轻锐, 难安易动”(《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这一点实际上也和西晋政府的政策取向有关。自从夺得江南以来, 首脑层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 在这块近乎半独立的地区, 拥有指导性地位的并非西晋政府发派的地方

收稿日期: 2008-11-30

作者简介: 李济沧(1970-), 男, 湖北武汉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官长,而是孙吴以来便雄踞当地的土著豪族^[4]。

作为年轻的皇族,307年首次出镇此地的司马睿本人,据说还是“威名未著”(《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名论犹轻”(《晋书》卷五十六《王导传》),虽贵为皇亲,但并不具备镇守地方的资历和威望。就纷乱时期最为有效的武力来看,尽管以宗王出镇的形式来到建康,但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却几近于零^[5]。《晋书·王导传》对司马睿初到建康的情景作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描述:“(元帝)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将这里的吴人,理解为江南的土著豪族或许并无不妥。按照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的观点,面对周馥与司马睿这两支由中央派遣且互为敌对的势力,他们需要观望一段时间后才能作出取舍判断^[4]。这条史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三条信息:其一,司马睿初到江南时并无足够的权威与武力,为此受到当地豪族的冷遇;其二,江南豪族有着足以轻视宗王的资本;其三,在应对国家权力时,江南豪族内部有着一定的统一性与自主意识,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尽管经历了上述初镇江南时的尴尬,但10年以后的司马睿却登上了帝位,成为东晋开国的皇帝。一介藩王的他之所以得继司马氏帝统,原因在于华北局势的激变。

“八王之乱”不但削弱了西晋国力,而且还给晋王朝带来了一个异常严重且最终给予其致命一击的事态,这便是导致北方异民族的相继南侵。其中尤以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率领的军队,彪悍勇猛,成为司马越心腹之患。311年三月,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忧郁而死。六月,首都洛阳陷落,313年正月,怀帝为刘聪所杀。同年四月,秦王邽(愍帝,武帝孙)于长安即位,318年国灭。华北情势一步步恶化的同时,另有一个值得注目的事态发生,即武帝直系子孙几乎死亡殆尽。在此过程中,逐渐受到天下瞩目的便是远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

洛阳于311年陷落之后,司空荀藩等人飞檄天下,推司马睿为盟主,抗击异族。也正是由此开始,司马睿的名字开始为天下所知,其权威也在某种程度上遍及全国。316年十一月,愍帝降于匈奴,翌年七月,以司空刘琨与鲜卑左贤王段匹磾为首,在北方坚持抗战的西晋大臣180人联名向司马睿上书,请其即位。在这篇上书中,特别强调“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即作为宣帝司马懿的唯一嫡孙,除司马睿外再无人能承继司马氏帝统。这种特殊的身份,正是抗战大臣联名劝进的最大理由^[6]。

东晋皇权的建立,除了司马睿身具司马氏帝室的血统这一点外,还有另一要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便是大规模的土庶南迁。《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即反映了这一状况。据学者估算,永嘉年间的战乱导致了约90万人的北方难民背井离乡,先后流寓到江南^[7]。其中,贵族士人不在少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句话同时显示出流民或贵族们是在追随晋室亦即司

马氏帝室之际来到江南的。可是,当整个华北地区遭遇异民族的侵入,陷入绵绵不绝的大混乱之际,能够作为晋室司马氏的代表,进而将整个汉民族的正统性集于一身的,除了司马懿唯一的后胤琅邪王司马睿以外,又有谁能做到呢?《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所载前秦石越所云“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如在人”,就如实反映出司马睿拥有相当程度的正统性,其权威与名分得到天下的公认,成为丧乱之际稳定民心的存在。

权威与名分固然是稳固皇权必不可少的两项条件,但是作为其核心人物的天子,如果没有一定的资质与政治能力,终究无法应对那错综复杂的乱离时代。那么,元帝司马睿的资质与能力又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从他来江南以前的经历中,寻找其端倪。

八王之乱爆发那年(291)父司马懿死去,年仅15岁的司马睿袭爵琅邪王,并以员外散骑常侍奉职于朝廷。据《晋书》卷六《元帝纪》这时的他“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为了不致卷入权力之争而显出一种恭谦韬晦的态度,所以当时人似乎不曾注意到他。但以善于甄别人物而著名的侍中嵇绍却认为他“异”,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晋书》卷八十九《忠义·嵇绍传》),识破了其与众不同之处,如果再将这一评价与《晋书·元帝纪》所述“幼有令问”合而观之,可以基本判断司马睿实际上是一位志向颇高、善于审时度势的人物。

可是,身处宗室同类引发的大争乱中,司马睿作为帝室一员,又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301年,赵王司马伦掌权,处事横暴,对此心怀不满的司马睿与名士陆机一道成功地逃离洛阳,并在304年加入到司马越阵营,此后作为左将军参加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斗。然而在荡阴遭遇惨败,司马睿极为艰险地得以脱身,但叔父司马繇终为颖所害。或许因为这份尽力,他逐渐得到司马越的信任,被授予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职务,负责留守司马越的根据地徐州。由此可以看到他与司马越之间已经有了某种信赖关系。如前所述,正是在司马越的指示下,于307年出镇江南。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司马睿的成长过程始终与八王之乱相随。在这场政治动乱中,无论政治经验还是阅读时局的能力抑或待人接物的态度都必定得到了充分的磨练。那么,作为尔后东晋皇权的建立者,渡江之后的司马睿又显示了怎样的为政态度,发挥了什么样的政治手腕呢?

首先是其“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晋书》卷六《元帝纪》)的性格,在东晋的再建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因而受到了史家的称赞。《世说新语·规箴》引邓粲《晋记》:“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王导深以为谏,(元)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励行俭约之治,勤于政务,谦虚容纳臣下的劝谏等等,刻画出了司马睿宽仁与大度的形象。《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时

王氏为将军,而(诸葛)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贤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谓(元)帝善任一国之才。”此为司马睿311年任镇东大将军时事,对追随自己渡江而来的琅邪王国土人量才录用,显示出了他用人之能,为此受到时人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用侨姓贵族以外,司马睿对出身江南的豪族也加以擢用,据《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初到江南,便采纳王导的建议,征召江南豪族进入自己的安东将军府,其中尤以军司顾荣极受尊重。对这一时期的司马睿,后与其产生矛盾、最终兵戎相见的王敦也曾赞其“虚心下士,优贤任人,宽以得众,故君子尽心,小人毕力”(《晋书》卷五十六《王导传》)。从上引纳谏、用人的几个例子来看,这段评语似非虚言。

北人南迁这一巨大的社会流动浪潮中,北人南人之间尽管存在着某些冲突和矛盾,但是基本上能团结一致,共建晋室,这些如果离开了司马氏皇权的号令与权威,几乎无法想象。《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憚(元)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这既说明在南北势力交错之际呈现出来的复杂局势中,司马睿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贤明”一语也表明,司马氏皇权之所以能为王朝重建发挥作用,与司马睿个人大力实施上述德政,致力于重建王朝的姿态大有关连。

二、国家权力中的皇权与贵族

有了充分的权威,再加上司马睿的贤明政治,在此背景下,东晋皇权似乎拥有稳若磐石的地位与权力。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仅看这一条史料,司马睿似乎极为尊敬王导,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便是在权威高涨的皇权背后,存在着超越常轨的君臣关系。那么,这一事态究竟如何影响现实的政治,进而影响到司马氏皇权的呢?

王导是司马睿江南镇守之际的策划人,也是东晋创业的第一功臣。尽管与司马睿同岁,但睿却呼其为“仲父”,十分尊崇。王导出身于司马睿的封国琅邪郡,《晋书·王导传》载“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十分清楚地说明王导与司马睿关系亲密。来到江南以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一族继续支持司马睿。其时,王导担中枢辅政之任,而从兄王敦则致力于平定江南各地的敌对势力,从311年开始,展开对江州、荆州方面的作战,至319年基本控制了荆州全局。《晋书·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仅此一句,就可以看到在东晋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王氏一族的功劳之大与威名之盛。

从此时的王、马关系来看,仍是“契同友执”(《晋书·王导传》),保持着极亲密的关系。借用司马睿的话说是“吾与卿(王敦)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晋书·王敦传》),用王氏的话则为“恩侔兄弟,义同交友”(《晋书·

卷七十六《王导传》)。两者之间似乎结成一种超越君臣上下,形同兄弟、“契友”的关系。^①可是作为臣下的王氏,其势力的扩大与司马氏皇权之间真的能够相濡以沫吗?而后者随着司马睿个人权威的提高,也在逐步膨胀。前引《王导传》载王敦曾有废司马睿之意,但被王导劝止,就是一个信号。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摆在王、马双方面前的一道难题。《晋书》卷六十一《周嵩传》:“是时,帝以王敦势盛,渐疎忌王导等。”针对贵族势力的扩大,首先采取行动的是皇权一方,也就是开始与王氏保持一定的距离。《晋书·王导传》也云:“及刘隗用事,导渐疎远。”看上去在疏远王导,但实际却非如此单纯,其背后暗藏着司马睿的一个重大政治决断,透露出此信息的是“刘隗用事”一句。《晋书》卷六十九《刘隗传》云:“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据此可知,其受重用是在司马睿为丞相的313年五月以后。在这一阶段,司马睿的政治方针显示出了某些特点,《晋书》卷四十九《阮孚传》:“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不能弃也。”也就是较为重视申不害、韩非子等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思想,而作为执行这项政策的人物,便是提拔腹心大臣刘隗等人。

细观《晋书·刘隗传》,自被委以刑宪以后,与其说是在“救世”,毋宁说专以法来对付周顗等贵族人物,对之加以严厉纠弹,如果再从刘隗“善求人主意”的性格特点来看,那么他的行动显然来自于司马睿的直接授意。据汪藻《世说新语考异》,齐梁间人敬胤就曾对司马睿推行法术主义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以法御下”。既然主旨在于“御下”,身为建康贵族之首的王导及其一族当然也不免受到冲击。例如其兄王含,外甥王籍之等人就受到了弹劾,到建兴年间(313—317),连王导本人也几乎被逼辞职。将“以法御下”与“导渐疎远”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显然司马睿是在意图摆脱“仲父”、“契友”这种私人之间的情谊,而代以君臣名分这种公共的立场来处理彼此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重视法术的倾向逐渐显露于313年以后。前面已述,对于司马睿来说,洛阳陷落的311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因为他的权威正是以此年为界而得以飞跃的提高。《晋书》卷八十九《忠义·虞诩传》:“元帝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时人谓之百六掾。”众多贵族士人被招致丞相府,实际上就体现了司

① 通过《世说新语·方正》注引《高逸沙门传》的一段记载,也可以印证两者的关系:“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竺道潜)。王公(导)、庾公(亮)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风靡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等贵族文化,随着大批贵族的南渡也盛行于江左,司马睿父子虽为帝室,但也受其影响,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拥有共通的学问,似也是王、马相互之间产生亲近感,能够同心协力共建晋室的原因之一。

司马睿的权威，而这当然也促使他本人借此提高自己的威信，进而巩固皇权。《晋书·周嵩传》载周嵩曾专门上疏辨明王导的忠贤，并指出东晋的再建是“此亦群才明，岂独陛下之力焉”。前面看到，疏远王导等人即在此时，显然司马睿是在自身权威得到巩固之后才走这一布棋的。周嵩的这句话显示出，伴随着权威的提高，司马睿逐渐失去了过去的慎重与贤明，开始显露出某些独裁的迹象。

如此来看，意图让贵族服从于自己，抑制其势力，正是司马睿重视法术的主要目的。不过，“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或是王敦所非难的“自从信隗以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晋书·王敦传》），都说明司马睿的政策并非是依靠客观制定的法，而是带有极为恣意的色彩。

司马睿为了加强皇权，开始用宗室出镇地方。司马氏帝室的传统本来便是分封宗室诸王，使其出镇，晋武帝或司马越都如此，司马睿也继承了这一点。313年，遣子司马绍（明帝）出镇广陵，317年又以子琅邪王裒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代绍出镇。即位以后，控制了江州、荆州等重镇的王敦势力成为司马睿的心腹之患。为了与之抗衡，再用宗王出镇政策，320年以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晋书》卷三十七《谯王承传》：“（元）帝欲树藩屏，以谯王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以抗王敦。”司马承的任务就是专门牵制王敦。对司马睿的上述政策，南宋朱熹作过一个论断，即“晋大封同姓，八王之乱以此，元帝中兴亦以此。”（《朱子语类》卷一三五）不过，武帝及司马越的目的是让宗王保卫中央，而司马睿的宗王出镇策却是同贵族强臣相抗。

依仗自己逐渐提高的权威，削除贵族的势力，从而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司马睿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实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王导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心境是“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晋书》卷五十六《王导传》）。所谓“佞臣”，不用说指的是刘隗等人。王导这句话，固然反映了贵族们受到来自皇权方面相当大的压力与猜忌，但“心思外济”一语，又显示出与司马睿相对抗的势力存在，这正是坐镇荆、江的王敦。

本来，司马睿重用刘隗等人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牵制王敦。《晋书·王敦传》：“（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阍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由此可知，重用刘隗的契机亦即法术重视与宗王出镇的政策实际上是同时实施，相互连动的，其矛头所向，正是曾经一心拥戴自己的王氏一族。这当然引起了王氏等贵族的强烈警戒。《晋书·王敦传》：“（元帝）以谯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于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两者之间的不信越来越恶化。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义起兵。四月，司马睿方面的军队迎击攻入石头城的王敦军，但一战而败。司马睿在同年冬天

于忧愤之中死去，年仅46岁。

《晋书·元帝纪》对上述王、马之争的结果作了一个概括，即“中宗失驭强臣，自亡其斧”。应该说，皇权与贵族之争的第一个回合，确实是以贵族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王敦用武力胜司马睿，并不能意味着贵族能排斥司马皇权而独占整个国家权力。据《晋书·王敦传》王敦掌握了朝权以后，搞得却是“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324年当他第二次起兵，目的并非清君侧而在取代司马氏时，尽管此时的对手明帝还没有其父那样的历练和权威，但还是立即遭致了失败。

以上我们看到，没有皇权的权威与号召力，没有贵族的协力与用兵征伐，东晋都不可能建立。但是司马睿利用自身的权威，在维护和巩固皇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打压贵族的措施。这些措施表面上试图以法御下，实质则在独裁专权，树立绝对的君主权。反观王敦，则意在利用手中的武力，控制皇权进而取而代之。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两者都没有成功。田余庆先生认为王敦第一次举兵，以“清君侧”为名，反对刘隗、刁协，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持，因为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不容皇权侵犯。而王敦第二次举兵，目标在取代司马氏，最终以士族的共同反对而失败，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对此田先生指出：“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1] 338}

平衡和共治，非常客观地指出了东晋初期皇权与贵族的的存在型态，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把这种平衡和共治作为一种分权体制来加以理解。从以上论述来看，基本可以说司马氏皇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人心的权威，所谓“夷夏之情，咸共推之”。至于贵族，除了同样具有传统的权威以及文化优势以外，在东晋初期更多地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占有。东晋的国家权力，体现了皇权与贵族亦即权威与权力分而合之的一种型态。当皇权利用权威意图削减贵族权力时，必然受到后者的有力反击。同样，贵族虽然势力强大，但终究代替不了皇权所具有的权威。贵族之所以为贵族，就在于他们是与皇权分权共治的存在，而非夺权自立。东晋初期，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争天下，皇权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相争与相融，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权威与权力之间分化、整合的过程。经过两次较量，皇权与贵族双方似乎找到了各自在国家权力中的位置。通过平衡与共治达致分权的体制，正是东晋国家权力的结构特点，而东晋王朝也正是在皇权与贵族的这种分权态势中得以长期维系的。然而，东晋国家权力出现分权体制的成因何在？越过国家权力本身的构造特点，应该说江南地域社会或江南豪族的力量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三、国家权力与江南社会

322年三月，在武昌举兵的王敦进至芜湖时，再次上表列举刁协的罪状。对此，司马睿大怒，下诏曰：“王敦恃宠灵，敢肆叛逆……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

封五千户侯。”《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这里可以看到司马睿有着相当大的自信与成算。这并非失去理性的狂怒言语,而是有其凭据的。

当初除了法术主义与宗王出镇之外,司马睿加强皇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积极组建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同时藉以防范王敦。《晋书·王敦传》:“(元)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据《晋书·元帝纪》,此为321年七月间事。首先派司马承出镇湘州,接着就是这次组建镇北、征西两个军府,目的都在防备王敦。

但结果却是司马睿苦心筹建的军队在王敦面前异常脆弱,一战而败。这不禁使人感到,司马睿的皇权强化政策有着某些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说,作为开国的天子,尽管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大力奉戴,有着充分的权威,但在其皇权结构的根底部,仍有某种弱点存在,致使权威与实际的支配力之间出现偏差。刘隗、戴若思受司马睿信赖组建军队,其构成主要为扬州奴。这些当然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江南豪族拥有的奴。由此可见,司马睿征发奴兵除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豪族的根本利益之外,更是皇权与江南地域社会之间冲突与对立关系的一种体现。

司马睿经略江南的最大弱点,在于直接拥有的兵力极端微弱。因此,不得不全面依仗当地豪族的力量。渡江之后,310年爆发的豪族钱璠之乱的平定以及针对周馥的讨伐作战,或是311年讨伐不服己令的江州刺史华轶,司马睿一方的军队几乎全是江南豪族所率兵力构成。因此,如《晋书·元帝纪》“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的记载所见,司马睿对江南豪族及其乡里社会进行了相当周到的怀柔。而当南北势力冲突时,例如314年,志在一扫北人的义兴周勰的反乱尽管被王导的妙策压制住,但仍“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晋书》卷五十八《周勰传》)。这样一种善后处理的措施,正是考虑到了周氏所拥势力之强的缘故。仅此一事,反映出了当时南北势力之间异常分明的力量对比。

但是,承继司马氏帝统的资望及名分,受到天下万民的推戴,激剧上升的权威,这些都促使司马睿下定决心要压制势力增长的贵族势力,进而强化皇权,此点已见前述。据《晋书·元帝纪》,318年七月亦即其即位四个月,便发布了下面一道戊申令,“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值得玩味的是,这道诏书的发布于同年六月刁协被任命为尚书令之后。《晋书》卷六十九《刁协传》:“(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本为贵族出身的刁协与刘隗一道,受到司马睿的绝对信任。《晋书·刘隗传》:“太兴初,长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寻代薛兼为丹阳尹,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将这两件事例结

合起来看,司马睿与其侧近的刘隗、刁协一道,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欲推行“崇上抑下”的政策,为此对江南豪族进行了“排抑”^[8]。

不过,司马睿的主要目标还是在压制贵族。为了对付琅邪王氏尤其是王敦的势力,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除了前述征发奴兵之外,据《晋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也就是另外发动豪族拥有的僮客,使其为刘隗、戴若思的军府运输军粮。这些都说明,司马睿在组建军队时,能够利用的似乎只有征发江南豪族的奴或客,除此以外,再无他法。因此,豪族政策的前后变化对他来说,又似乎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为了压制贵族,提高皇权,司马睿所采取的一系列抑制豪族,征发奴、客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百姓嗟怨。……百姓哀愤,怨声盈路”,“众庶怨之”《刁协传》)等等记载,就如实地反映了江南豪族的不满。而且,这些怨恨不久便体现到了具体的行动上。322年正月,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在武昌起兵。三月,元帝召回刘隗、戴若思,使其防卫建康。四月,王敦的军队到达石头城,其时,负责守备的是江南最强的豪族义兴周札。周札此时采取的行动却是自开城门接应王敦。于是,王敦军队一气攻入城内,击败了刘、戴的军队,控制了建康。

这里,有必要看一下王敦军队的构成。从311年的华轶讨伐作战开始,王敦从江州向荆州方面展开攻势;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东晋方面全面依仗的是南人甘卓、周访以及陶侃所率的军队。直到319年,在周访消灭了反乱势力的杜曾以后,长江中游地区才逐渐恢复了安定。因此,在王敦起兵的322年,他的军队基本上由南人组成,此点应无疑意^[9]。从别的角度来看,他的主要参谋为江南豪族的沈充与钱凤这二人,也可以证明上述判断。尤其是响应王敦而举私兵的吴兴沈充,与义兴周氏比肩,号称“江东之豪,莫强沈、周”《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札传》),为江南最强势力的豪族。

这样看来,王敦讨伐军极有可能是由江南豪族支持或直接构成的,其中便包括了沈氏的私兵。作为内应的周氏也同样是江南最强豪族,而同王敦军队作战的,也是由江南豪族的奴所组成的刘隗、戴若思军队。面对这样一个几乎全由江南豪族组成的武力世界,“欲排抑豪强”的司马氏皇权归于败战,可以说理所当然。所以,从表面上看致力于强化皇权的司马睿政策经此一战而趋于失败,而且是败给了贵族的势力,但从本质上而言,导致东晋皇权无法得到伸张的根本原因,却是跟随司马睿对以周氏、沈氏为代表的江南豪族造成损害,由此引发他们反抗的刘隗、刁协等一系列排抑豪强的政策。

反过来再看战胜了皇权的贵族。前面看到,王敦第一次起兵,亮出的旗帜是清君侧,并且还显示了同情受皇权侵害的江南豪族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得到了豪族乃至整个江南社会的支持。也就是说,与其认为王敦的胜利反映了贵族权力战胜皇权的权威,更应注意到豪族的动向在皇

权与贵族发生争斗时所产生的影响。王敦第二次起兵,除了欲取代司马皇权之外,还有欲剪除江南豪族势力的意图,如杀周氏一门就是一例。其最后失败,固然由于明帝调动了北方的流民军队,但没有得到江南豪族的支持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1] 339。

综上所述,由皇权威与贵族权力构成的东晋国家权力始终受到了江南豪族势力的制约。至少在击败王敦的流民兵团出现以前,无论皇权或贵族,其最基本的力量亦即兵力的构成全都仰仗江南豪族。从与国家权力保持一定自律性的立场对江南豪族以及豪族社会的具体状况进行考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课题,现在虽然不能就此展开全面论述,但想涉及江南豪族一个侧面,这就是面对国家权力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对策。

权威、名分和正统性,这些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要素是支撑东晋皇权的有力支柱,在天下大乱之际,它有着极为现实的作用,而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江南豪族的眼睛。例如,虽然他们在江南社会拥有强大的支配权,但在永嘉之乱以后面对从华北蜂拥而至的巨大的流民浪潮,应如何对付,可谓当务之急。而在那时,能够使流民维持一定秩序的,除了“宣皇之胤”的司马睿以外,再无别人,于是豪族们很快作出了判断。《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本来到江南的当初,面对深感自卑的司马睿,顾荣等豪族们开始表现出了不信或轻视的态度,但此时态度为之一变,转而积极与之合作。几年后,当侨姓贵族推戴司马睿时,南方豪族,比如纪瞻等人积极响应这一行动,强烈请求睿即位。《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云:“及长安不守,纪瞻与王导俱入劝进。(元)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去御席。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动容。”江南土著豪族们的这一合作姿态,在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北人流民到了江南以后,一部分成为豪族的僮客,耕力于他们的大土地经营之上,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大部分又都在司马睿的命令下,滞留在长江北岸,被禁止继续南下。当然,这里有着利用流民的力量,使其作为藩屏为东晋防御北方异民族政权南侵的意图,但同时如果继续南下,就有可能与江南豪族发生冲突,所以上述措施又有着为了保护江南豪族利益的侧面在内。再如,北方贵族来到江南以后,有着“求田问舍”的倾向,但也都只是寻求土壤较为贫瘠的沿海地域,其理由仍然还是为了避开豪族势力最大的三吴地区^[9]。

江南的豪族由于欠缺足够的权威与名分,所以在司马氏皇权和侨姓贵族面前不得不有所妥协,如普遍官职不高等等,这也是东晋初期南北之间时而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是从上述来看,他们在保护自己代代支配的地域社会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而且在对应国家权力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协调性与主体意识。要之,以皇权和贵族构成的国家权力与拥有社会经济、军事实力的江南豪族之间形成的分

权态势,通过东晋初期的风云激变愈显清晰。

结 语

东晋皇权的权威与贵族的权力构成了国家权力,但是它们都植根在江南地域社会之上,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所以可以认为,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分权态势。但这种分权,并非是有意识的分权,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贵族将无法存在,豪族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没有贵族,皇权将失去依靠,无法应对豪族;而没有豪族,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因此当皇权受到威胁时,要出手相助,当皇权强大以致侵犯自己利益时,就必须予以压制,这些正是分权体制的特点。东晋出现的几次旨在强化国家权力的尝试,全都是因为地方社会的存在而走向失败,这就说明了地方社会以其社会和经济的实力,与国家权力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并发挥着影响作用。

然而,我们最终所关心的问题,即在此分权体制下的江南人民的生活如何,他们主体上的意识又如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呢?通过本文的论述,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线索,首先是豪族社会整体力量强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民众不受国家权力的过度侵扰;其次,豪族社会的整体力量强大必然建立在豪族与一般自耕农相对稳定的关系之上,因为如果两者关系紧张,那么就无法对付来自国家权力的侵扰。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似乎可以探寻到江南社会民众生活及其自由的问题,这些即是今后准备予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2] 陈寅恪.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M] //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3] 唐长孺. 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M] //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川胜义雄. 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M] //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东京: 岩波书店, 1982.
- [5] 川胜义雄. 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M] //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东京: 岩波书店, 1982.
- [6] 越智重明. 东晋政权と东晋贵族制[M] // 魏晋南北朝の贵族制. 东京: 研文社, 1982.
- [7] 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J]. 燕京学报, 1934 15(3).
- [8] 唐长孺. 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M] //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107.

[责任编辑: 那晓波]